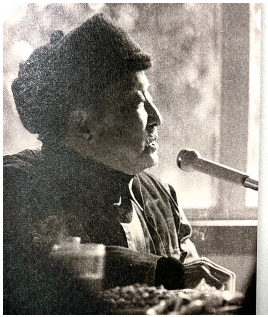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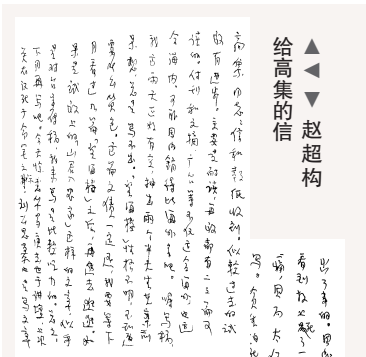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封《新民晚报》老社长赵超构写于1985年的珍贵回信,透过张宝林先生的细致解读、历史钩沉,折射出几位文化老人饱经沧桑后的绵长友情与敏锐智慧。——编者按



▲ 赵超构先生



▲ 赵超构给高集的信

◆ 张宝林

读赵超构致高集的一封信

赵超构为什么『少说为佳』

赵超构十四日

这是上海《新民晚报》社长赵超构写给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高集的一封信。落款时间只有日期,没有年份和月份,信封上的邮戳,也模糊不清。年份好办,很快认定是1985年。但究竟是几月?却费了一些工夫。我开始以为是7月,因为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是7月1日正式出刊的。后来,给《新民晚报》李天扬兄看过本文初稿,他说应是6月。理由是:“华老逝于6月12日;而且,上海6月是黄梅天。7月,就是酷暑了。”他还认为,赵超构评价的这份(或几份)海外版,仍是试刊,他是说后期试刊比先前试刊有进步,不是和正式出刊作比较,正式出刊,就不必寄了,说的有道理,采纳他的说法。

二

我的岳父高集(1920—2003),是资深报人,早年在《大公报》担任记者、采访主任、驻京办事处副主任。1949年2月,天津《大公报》改组为《进步日报》,高集任社务委员兼编辑主任。1950年4月,由范长江介绍到《人民日报》工作,历任文教组副组长、政法组副组长、西方部副主任、国际部副主任。1985年,海外版筹备期间,和谭文瑞、余焕椿、徐麟同任领导小组成员。1985年7月1日正式出刊后,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,负责言论和副刊,直至1988年离休。

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筹备期间,高集曾亲赴上海,召开座谈会,并登门拜访,动员上海的老朋

友们为海外版写稿。赵超构是高集的几十年的旧友,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就很熟悉。虽然赵超老当时已年过古稀,也受到邀约。报纸每次试刊,高集都给赵超老寄样报征求意见,并请这位名满天下的老报人赐稿。这封信,是老人家收到第二批试刊后的回信。其实,我岳母高汾,和赵超老更熟,还两度是他的老部下。重庆时代,她就是《新民报》记者。当年与浦熙修、彭子冈,都是活跃在大后方的新闻界女杰。1949年后,历任《大公报》《中国财贸报》《经济日报》记者、编辑。1986年退休后,她又归于赵超老的麾下,被陈铭德、邓季惺伉俪,礼聘为上海《新民晚报》的驻京办事处主任兼编辑、记者兼办事员。那时的驻京办就高汾一个人。因为她的杰出贡献,她成了《新民晚报》的终身荣誉职工。所以,赵超老在信中,专门附笔“致意”。

他们虽天各一方,但联系从来

未断。除了书信往来,还多次见面。每次赵超老来京开会,高集高汾都要去住处探望,还会约上几位老友一起下馆子小酌几杯。

三

赵超构,笔名林放,《新民报》元老,浙江省文成县人。民国时期就是著名报人。1949年后,除了继续担任《新民报》社长,还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,是文化界著



▲ 前排左起:邓季惺、陈铭德 后排左起:高集、高汾、郁风、钱辛波、吴祖光

名的社会活动家。

赵超老的高光时刻,是1944年的那次著名采访。他参加记者团访问延安,随后撰写了十几万字的长篇通讯《延安一月》,在重庆和成都的《新民报》连载,当年11月出版了单行本,后来,又再版、三版,轰动一时。这本书由陈铭德、张恨水作序,成了赵超构的代表作。正如陈铭德在序言中所说:“更使我们满意的,是作者具体的提供了一种立言的态度。对于延安事物,虽然有时是介绍,有时是批评,但自始至终,看不到有一句话是离开国民的公正观点的。”

赵超老集报人、作家、社会活动家于一身,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却是他的杂文。他从1943年开始在成都《新民报·晚刊》开辟《未晚谈》杂文专栏,一直持续到上海的《新民晚报》副刊《夜光杯》,一直没有停止杂文的写作。

《未晚谈》是他的专栏,也是他的名片。他一生写政论、杂文近万篇,绝大部分是杂文。他的杂文,卓然不群,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。篇幅短小,酣畅淋漓。读他的杂文集,令人想起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里的话:“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。”举凡政坛风波、烽烟战事、万邦动态、市井琐闻,无不入其法眼,而发为评论,皆中肯綮。

四

高集无疑是想借助赵超老的这支椽笔,为新创刊的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增光添彩。但是,1985年的赵超老,已然75岁高龄。他会答应吗?

让我们仔细看看赵超老这封信是怎么说的。

开头说了些客套话,接着,他说写些什么,还没有考虑好,但答应“文债一定还”。下面的文字有点伤感。他举了几个例子,华罗庚、关在汉、刘思慕这几个老人匆匆离世,都与劳累有关,他不得不有所顾忌,“太伤脑筋的文章就不‘敢’拼命写”。接下来的话就很有意思,足堪细品。接着,他提到了《人民日报》一篇文章——《大好时光忙些啥》,这是篇什么文章?我决定做一番考证。

先查了百度。没有找到关于这篇评论的出处。但意外发现,我的研究生同学——做过《人民日报》评论部主任,后来升任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的于宁出过一本书,书名正是《大好时光忙些啥》。这本书于1997年10月1日出版,是一本理论随笔集。我猜想,既然书的著者是于宁,书名又是《人民日报》的那篇评论,那么,这篇评论的执笔人一定是于宁兄。

于宁兄比我几岁,身体也不太好,所以,我请原报社的一位

同事,也是《人民日报》报史研究专家祝华新帮我检索一下。他很快反馈,刊发时间是1985年5月30日,版次是头版重要位置。

五

评论文章不长,680多字。主题正如标题标示,是对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工作作风的语重心长的询问和提醒。

这篇文章,态度温婉,语气和顺,并无疾言厉色,指出的问题也不涉政治立场、态度,不过是一般性的批评。请看下面几段文字:

“年年月月日时时,时间老人对每个人的赠予十分公平。时时日日月月年年,每个人对时间老人的回赠却大不相同。大好时光忙些啥?谁都应该好好想一想,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更应该多想一想。”

“……有的同志却是另一种‘忙’:忙于开各种不解决问题的会议,忙于搞不疼不痒的文件,忙于参加各种‘内事活动’,忙于部署应付检查、参观的表面文章……”

“他们是有效地利用时间,还是无谓地浪费时间,都会影响成千成万人。”

“在改革中,各种实际问题、政策问题、思想问题纷至沓来,迫切需要正确解决。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加强责任感,改进工作作风,跳出‘文山会海’,深入实际,认真研究,慎重决策。”

“让我们翻翻自己的记事簿——忙了些什么?成效怎么样?再查查今后的日程表——准备忙些什么?其中哪些事需要增加时间、多花气力?哪些事应当减少时间、甚至免掉?”

很明显,评论是批评那些主观主义、形式主义,不愿动脑筋解决实际问题的作风。这些毛病,其实并非只是干部队伍的主要问题。即便如此,这些问题也并非小恙,而是痼疾。试看,从上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开始,到改革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,党和政府发布过多少文件,反对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。

六

想来,赵超老对此必有深切体察。1957年“大鸣大放”前后,他写了一百多篇针砭时弊的杂文,有的比较温和,有的则很激烈。其中《先锋何在》,批评新闻界缺乏敢于直言的先锋。毛主席念旧情,保了他,使他幸免于难。但“文革”爆发,他这个“漏网大右派”挨整多年。

文章引起赵超老同慨,他说,我觉得有许多不必要的“忙”偏是自己找出来的。后面,是这封信的最后一句:“恭为老朽,当然以少说为佳。”

赵超老不想说了。是的,他说了一辈子,不想说了。依然是《未晚谈》的笔法,不必说穿,点到为止。

最后,回到开头约稿的问题:赵超老践诺没有?他给“望海楼”写文章了吗?

可以肯定的是写了。多年前,我为写岳父母的传记,查过那几年的报纸,在“望海楼”专栏作者名录中有赵超老的名字,但是,究竟写了什么,当时没在查。现在想查,却大不易了。一些老朋友说,查阅手续非常繁杂,最后无果而终。